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23.03.006

“断亲”：概念、问题及思考

陈友华，宗昊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带来家族主义到个体化的转向，对于亲属关系而言，人们不仅受到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理性考量，“断亲”现象愈演愈烈，值得仔细探讨。本文构建了基于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重新定义与描述“断亲”现象，并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出发，挖掘“断亲”现象的孕育土壤。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断亲”致使宗亲互助隐退、家庭功能被削弱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交成本。“断”后亦有重联现象，即“伸缩性弹簧的回归”。“断亲”不仅仅反映出个体对亲属关系的理性选择，更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重塑。

关键词：“断亲”；亲属关系；社交关系网络；理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23)03-0069-17

一、引言

不愿意走访亲戚、不愿意回家过年、不愿意参加亲戚间的聚会……这一代年轻人似乎更想要一种“走亲戚自由”的权利，而被忽略的长辈们则越发地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孝顺、亲情观念淡薄。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亲情观念，现今正经历着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圈层的碰撞。回到现实，有些亲情对于双方来说确实都是一种负累，年轻人一回家就被亲戚缠着问学业、工作、婚姻，但让长辈谈论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也并不实际，因而强行维系关系有时就成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亲属关系的加速淡化与疏远，使得社会、媒体以及学界不得不开始关注“断亲”现象。有学者将青年“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①

实际上，“断亲”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仍旧没有被梳理清楚，值得细致探讨。从“断亲”的概念来看，“断亲”只发生在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吗？“断亲”的主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

作者简介：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胡小武、韩天泽：《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第37—43页。

与对象分别是什么？亲属关系真的“断”了吗？如何通过中国社会结构的嬗变视角去理解“断亲”现象？“断亲”究竟是顺流还是逆流？此局面改善之可能又在何处？当代社会人们“断”的只有亲吗？以上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并严肃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部分问题展开研究并予以回答，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此研究之中，共同推动对于“断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家庭现代化与社会交换：“断亲”现象的理论模型构建

滕尼斯对于亲属关系有过这样一段生动描述：“亲属关系将房屋当作它的场所，仿佛房屋就是它的身体。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地占有并享受着好东西。”但显然，不同社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以及适宜生存的土壤，传统社会血缘、姻缘与地缘构成“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际互动与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进入现代社会后，血缘、姻缘与地缘逐渐让位于业缘、利缘与趣缘，这也渐而引起了本研究对于家庭关系与亲属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一）不单单是血缘：何为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相较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而存在，它包括由生育带来的血亲群体和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①换句话说，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配偶带来的姻亲群体是亲人。亚里士多德讨论亲属关系时，更是将之包容于相互归属的更大意义中，“父母爱孩子，把他们当作自身；孩子爱父母，把他们当作自身的来源；兄弟间血脉相通，骨肉相连”^②。这类似于中国人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亲属关系：亲人血浓于水，属于彼此亦是相互依赖。

实际上，亲属关系不仅能够在血缘上得以解释，在社会意义上亦能建构。由于某些时代与地域太过遥远，我们无法窥探世界各地亲属关系的全貌。举例来看，苏拉威西岛的托帕默纳人，其父母关系是通过产后养育形成的：“孩童们从一个家流动到另一个家中很容易，他们的父母观根植于养育和共同的消费。”^③内必利尔山谷的新几内亚人，其亲属关系是由克崩（ko pong），即油脂和脂肪的传递产生的，^④这类似于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土地和人类的拥有者之间有交互主体性关系或是亲属关系，^⑤毕竟油脂的传递依赖于在同一片土地上分享食物、共进晚餐，而土地又和人们的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亚马孙人来说，记忆本质上也与亲密关系相连，抑或

①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第49—58页。

②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61—1162.

③Albert Schrauwers, “Negotiating Parent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inship’ in Central Sulawesi”,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6, no. 2 (1999), pp. 310—323.

④Merlan Francesca and Alan Rumsey, *Ku Waru: Language and Segmentary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Nebilyer Valley, Papua New Guin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2—45.

⑤Marx Karl,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tin Nicolaus trans., UK: Penguin, 1973, p. 471.

记忆就是亲属制度本身。^① 无论是收养与寄养、分享食物、共处同一片土地，抑或是拥有共同的记忆，社会建构的亲属制度，在某些土地上充当着生理与生育的必要补充。因而，萨林斯将亲属关系定义为：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网络，这就意味着亲属之间是彼此共存并相互依赖的。这样的亲属关系定义，类似于斯黛丝一开始将家庭简单定义为对亲属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安排，而后在 21 世纪的家庭研究中，超越了血缘与婚姻的束缚，扩展为相爱和彼此关心的一群人。^② “亲密关系的集合体”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存在的相互性”则包容了所有的亲属关系。

如今再次审视亲属关系的概念，滕尼斯“同一个屋檐下”的比喻充满温情，但在现代社会中物理的空间却太过狭窄，也并不实际，萨林斯“存在的相互性”外延又太宽，只要参与和分享了对方的存在就是亲属，无法区分亲属关系与其他社会联系，也无法确定个体在亲属团体内的身份。^③ 在此，并非辩论有关亲属关系长达一个世纪的“生物性-文化性”之争，也并非对亲属关系的定义进行批判与再阐释，只是强调亲属关系其实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关系，更是一种社会性、文化性的关系。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亲属关系，而非局限于血缘等生物性联系，是打开现代亲属关系大门的重要钥匙。据此可以观测具有“伸缩性”的家庭场域，亦可更好地理解“断亲”之可能。

（二）传统与现代：家庭现代化理论简述

从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理解“断亲”中“断”的情形，并非起源于西方学界一致认为的工业社会。时间可以追溯至讲爱斯基摩语的人群，其亲属关系充满着弹性，亲属关系不仅可以被建构，也可以在实践中被消解，“如果人们觉得某些亲属关系不让人满意，他们就可以解散这样的关系，也可以选择相当多的亲属关系”^④。人们有改变亲属关系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本身在经受改变，也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没有确定的性质和行为规范。^⑤

相对于格陵兰岛人决绝地解散亲属关系，现代意义上亲属关系的淡化显然较为隐性与缓和，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亲属关系正悄然疏离。支撑家庭生活的不再是集体意识，而是越来越决定家庭生活之全部的劳动分工，^⑥ 这也暗示着家庭神圣

① Anne Christine Taylor, “The Soul’s Body and Its States: An Amazonian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Being Huma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2, no. 2 (1996), pp. 201–215.

② Stacey Judith,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r-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270.

③ 刘倩：《亲属关系研究的变革与困局——评萨林斯〈亲属关系的是与非〉》，《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41—47、84页。

④ Nuttal Mark, “Choosing Kin: Sharing and Subsistence in a Greenland Hunting Community”, in Peter P. Schweitzer eds., *Dividends of Kinship: Meanings and Uses of Social Relatednes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33–60.

⑤ [美] 马歇尔·萨林斯：《亲属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陈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页。

⑥ [法]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4页。

性的衰弱与重要性的下降。^①

与亲属群体切断联系的“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成为确定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②帕森斯所述的“核心的孤立家庭”成为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并渐而盛行。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包含的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常受到质疑，也一再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由此演化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③主要观点有：1. 现代化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依赖作用，并且经常需要传统观念的支持；^④2. 尽管核心家庭是主流形式，但家庭变迁也存在多种路径和模式，家庭纽带和亲属间相互援助与情感支持依然存在，家庭并非完全孤立；3. 亲属关系的影响力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独立于亲属网络之外。^⑤

家庭现代化理论带来的启示是，工业化下不断萌芽的个人主义，催生出“关系更多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的价值观念。利益原则、经济利益纽带、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等理性因素，越来越多地替代疏密不同、远近有别的血亲、姻亲关系，改变了传统亲属关系的内涵。^⑥具体来说，传统亲属关系出现理性化的发展趋势，即表现为注重经济利益。^⑦核心家庭内部情感性交换可能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核心家庭之外，则由工具性、利益性主导。^⑧

（三）个体的理性选择：“断亲”现象的理论解释模型

举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是你的亲戚，另一个不是；他们有你需要的某种东西，你会找哪个去请求帮助，答案是我当然会去我的亲戚那边，如果他没有给我，另一个人给了我，我就会知道另一个人真正是我的‘亲戚’”^⑨。

这背后包含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交换，社会交换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界，其以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基本观点是：行动者是理性的，理性行动者为达到需求的满足与他者进行交换性互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资源主要

①肖文明：《作为道德机构的家庭：涂尔干论家庭》，《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65—88、227页。

②[美]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42页。

③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82—216、246页。

④Joseph R. Gusfiel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2, no. 4 (1967), pp. 351—362.

⑤[美] W. 古德：《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54—259页。

⑥唐灿、陈午晴：《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92—103页。

⑦谭同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村田野经验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第114—129页。

⑧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2016年第1期，第186—212页。

⑨Marshall D. Sahlins, *Moala: Culture and Nature on a Fijian Isla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204.

来自家庭以外的市场交换，损失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是获取生活资源的两个基本动机。^① 如果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待“断亲”，断掉的是那些非主观选择的、一年都未必能见一次面的仅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亲近的是在经济与情感上都能带来慰藉的家人，在这样良性的亲属关系维系中，双方都能得到经济属性与情感属性的“报酬”。因此，在沈奕斐的三角形理论框架基础上，可以建立“断亲”现象下的社会、家庭与个人三角形理论框架（图1）。上述所言也交代了“个体→家庭”指向的理性选择与交换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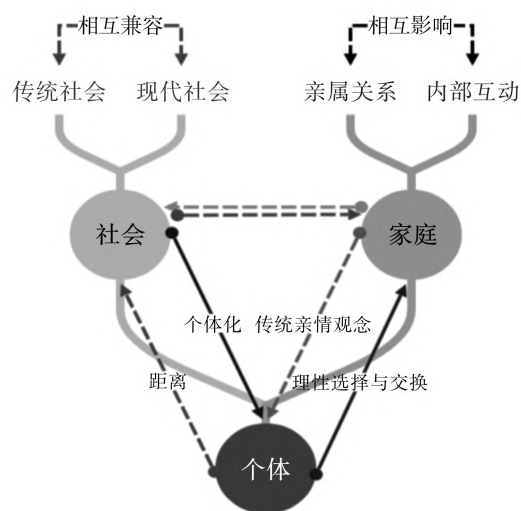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随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必然产生家族主义到个体化的转向。中国的传统社会盛行家族主义，家族是抵抗自然风险的基础。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中国人的中心价值，也是世代延续的形式。^② 如果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通常个人需要妥协，以家庭利益为重。当代社会的家庭则多是个人利益的相互协调，个体不再追求统一的大家族利益，选择“过自己的生活”，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如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所指出的那样：“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③ 以上是“社会→个体”指向的个体化描述。

显然，个体化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去传统化，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亲属关系对家庭和个人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④ 亲人永远是你最亲的人，亲情观念终究是家庭的基础，家之所以为家，是因为有亲情，否则只是居住的房屋。故而传统亲情观念中温暖人心的思念、寄托与回望仍旧牵扯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内心，个体也正是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充盈之下，才显得更为丰满，这也是为何本研究在阐述亲属关系时，更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兼容，而非无条件的现代化转向的原因。“家庭→个体”指向之间，仍有着传统亲情观念的影响与束缚，在个体化与亲情观念的双重作用下，活在自由与决定交织中的我们，才显得更有张力。

在家庭内部可以发现，亲人间的互动产生影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时候父母较忙，因而住在奶奶家，与奶奶的互动较为频繁，与奶奶的关系相较于外婆来

① Lin Nan,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0.

② 刘创楚、杨庆堃：《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③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1—342页。

④ Janssens Angeliqu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The Household as a Process in an Industrializing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6.

说，自然更为亲密”（访谈对象 Q1）。家庭与亲属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由于亲属关系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家庭的互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亲属关系可能还是以之前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部分年轻人选择“断亲”，但年长一代始终难以接受亲属关系的疏离，因为亲属关系的能动性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得以转换。

从“个体→社会”的指向来看，“断亲”的背后存在着青年对亲友关系、职场关系、师生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的重塑。重塑与改变的背后，是通过距离来表现并且通过距离去观测。进入当代社会，人们在记认亲属时不再遵照同一体系，而是根据利益、亲密关系等来确定远近。^① 亲属关系并非不再重要，而是变成一个可供选择的体系。当跳脱亲属关系的研究视角去看待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时，可以发现有的挚友甚至会排在其他远亲甚至兄弟姐妹前面。因而个体对于社会而言，有着自己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解、选择与重构。

总之，在本研究建构的亲属关系意义上的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三角形理论框架中，尽管强调个体的理性选择对于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但仍旧不可忽略结构对个人的束缚。此外，个体化的转向并非只有益处，个体化也会面临“空虚时代”与“公共人的衰弱”等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港，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②。

三、重新定义与描述：何为“断亲”？

“断亲”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兼容下，基于个体的利益、志趣或情感判断以及对于亲属关系的情感体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之前媒体有关“断亲”的描述，更多是仅从青年群体出发，关注最为常见的青年“断亲”现象，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断亲”现象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亲”绝不仅有一个方向，这越发引起我们对“断亲”主体、“断亲”对象以及“断亲”实质的思考，同时亦需要回归生活中生动的样本去描述。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描述

家庭是相对封闭的场域，因此研究者很难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进入他人的家庭场域中去观察具体的家庭互动行为。此外，访谈对象在被研究时完全可以出于塑造完美家庭形象的考虑，闭口不谈其家庭内部是否存在“断亲”现象。因而，针对研究材料获取的困难，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一方面，访谈对象中有研究者的亲戚，研究者也正在经历“断亲”过程，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另一方面，所谓“熟人之间无秘密”，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大大增强访谈对象提供信息的可信度，故其余访谈对象皆是建立了一定社交关系的朋友，以求所整理的结果展现最

①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以上海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第112页。

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大的真实。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对象的行为表述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资料搜集时间为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采样地点为南京，主要访谈了 10 位完全“断亲”、部分“断亲”或仅有“断亲”倾向的人员，年龄从 20 岁至 80 岁不等，男女比例均等，职业多元。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第一，自身是否存在“断亲”行为，是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第二，“断亲”的对象主要是哪些家庭成员或亲属；第三，“断亲”的因素有哪些；第四，对于“断亲”的主观感受及态度如何。针对但不限于以上问题进行探究。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访谈对象	年龄	性别	职业	是否成家	仍亲密联系的亲属	“断亲”态度	最主要原因
Q1	25 岁	男	学生	否	(外) 祖父母、父母、叔、伯、舅、堂(表) 兄弟姐妹	主动“断亲”	理性选择
Q2	26 岁	女	媒体工作者	否	外祖父母、母亲	被动“断亲”	父母离异
Q3	25 岁	男	辅导员	否	(外) 祖父母、父母、叔、伯、亲兄弟姐妹	主动“断亲”	理性选择
Q4	20 岁	女	学生	否	(外) 祖父母、父母	主动“断亲”	学业繁忙
Z1	31 岁	男	学生	是	(外) 祖父母、父母、叔、伯、姑、舅、姨	被动“断亲”	迁移流动
Z2	42 岁	男	经理	是	(外) 祖父母、舅、女儿	主动“断亲”	工作繁忙
Z3	53 岁	女	媒体工作者	否	父母、堂(表) 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女)	主动“断亲”	理性选择
L1	73 岁	女	退休	是	未发生矛盾的亲戚	主动“断亲”	家庭矛盾
L2	79 岁	女	退休	是	子女、亲兄弟姐妹、儿媳、女婿、孙子(女)	主动“断亲”	理性选择
L3	80 岁	男	退休	是	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女)	被动“断亲”	迁移流动

对于访谈资料，需要补充几点。第一，由于“断亲”现象存在主体的多样性，故而在访谈之前，需要对访谈对象进行年龄分组，是否成家是一项重要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成小家的方式从大家庭中分离，然后借“空间距离化”达到“关系距离化”。第二，家庭成员构成不同，“断亲”的对象难以细致化统一归类，但可以从“有亲密联系的亲属”入手，大致反推“断亲”的对象（这也恰恰体现出“断亲”现象的常见）。第三，从“断亲”的态度出发，“断亲”可以分为主动“断亲”与被动“断亲”两种类型，一般由于迁移流动或是家庭原因，人们常常被迫“断亲”，但哪怕是在被动“断亲”的情况之下，亦可发现其有主动“断亲”的想法。例如，“我是因为父母离异，所以和父亲那边的亲戚都没有来往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和那些亲戚哪怕联系应该也聊不到一块儿去，我也不情愿”（访谈对象 Q2）。因而，“断亲”多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交织。第四，在访谈过程中，工作或学业繁忙、生活压力大常成为“断亲”的替代理由，但结束无效的亲属社交本就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是受访者不愿明示。第五，从情绪上观察，“断亲”有较为温和、隐性的“断亲”，这是最为常见的“断亲”样态，但亦有“老死不相往来”、剧

烈的“断亲”。一些难以调和的家庭矛盾，会导致某个家庭和另外某个亲戚所在的家庭“老死不相往来”。例如，“他们家说我闲话，也不欢迎我，我干吗要热脸贴冷屁股呢？以后就不走动不来往了呗”（访谈对象 L1）。

（二）似断非断：对“断亲”的重新定义

在传统社会，五代之内具有血亲关系的可以称为家族成员，过了五代，民间称为“出服”，也就是“断亲”的意思，自此之后，就不再是家族成员，而是一般的外人，最多可称为“500 年前是一家”（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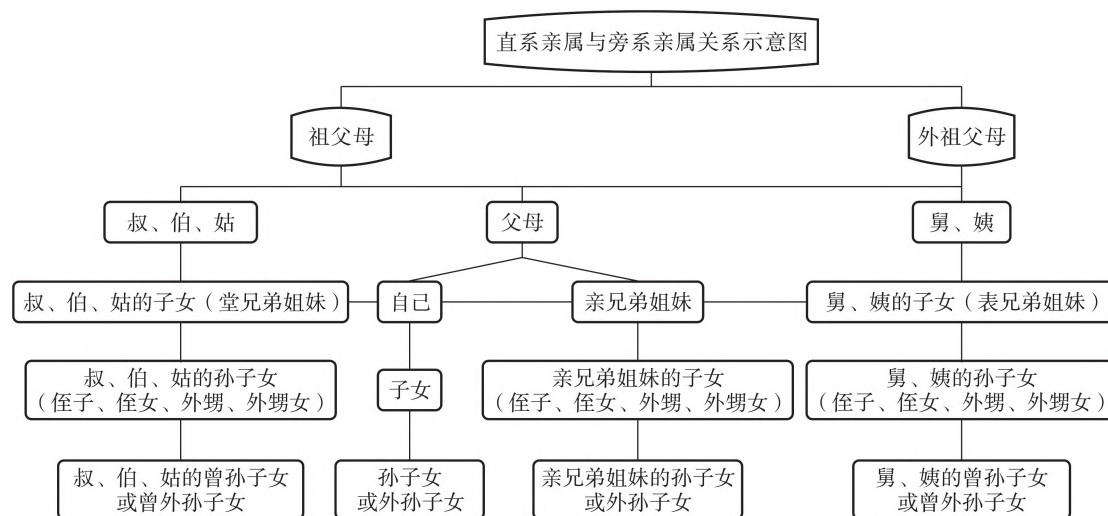


图2 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关系示意图

走向现代社会，“断亲”现象多种多样。若以性别视角去看待“断亲”现象，可以发现：一是原生家庭有女孩的寄养家庭，在女孩长大婚配后，夫家才被视作女孩自己的家，女孩视原生家庭成员为亲戚关系而非家庭成员，亲子关系似乎断绝了。二是男孩长大成家后，一般会分家单独过，因而也算是“断亲”的一种，这里可以把成婚分家视作成人礼，标志着男性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成婚造成的“断亲”现象不仅有隐性、温和的一面，还有因为高额彩礼等习俗造成的戏剧化冲突。

若以代际的视角去看待“断亲”现象，首先是纵向的年轻人对于老一辈的“断亲”。此类现象也是现实生活以及媒体报道中最常出现的，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与亲戚互动本就很少，再加上受价值观、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自然对亲戚表现出淡漠。其次是代内的横向“断亲”。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长者之间的“断亲”，老年人普遍出现“故土难离”“思亲如故”，是因为曾经的共同经历与共同的价值观使然，但即便是老年人，由于价值观与社会地位等不同，也很难聊到一起。如果出现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如前文所述出现某个家庭和另外某个亲戚所在家庭“老死不相往来”的场面，这是由于长辈之间的“断亲”使然。另一类是年轻人同辈之间的“断亲”，与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关系的疏远。例如，形容昔日的

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虽然是戏言，但实际上意味着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心境的变化、人生目标的转移、世界观的改变等，差异较大的人群之间很难有共同的语言。以此类推，同龄人之间由于生命历程不同，尽管是亲人，但部分年轻人与其他人生轨迹不相同的同龄人之间很少有交集，也很少有共同语言。“在饭桌上，也常能听到父辈对于子辈的教导：‘你们年轻人之间要多交流、多来往呀。’”（访谈对象 Z2），这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人之间的“断亲”现象严重。

“断亲”现象错综复杂，需要进一步定义。本研究赞同将亲属关系视为“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关系网络”^①，主要考察在亲属关系中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因而本研究将“断亲”重新定义为：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三代以内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的一种过程。该定义相对于之前胡小武对于“断亲”的定义，^②有以下几个要点需要阐明。

第一，“懒于、疏于、不屑于”的说法生动又形象，注重个体“断亲”的心理过程，“懒于”的背后是觉得社交麻烦，“疏于”的背后是工作与学业繁忙，而“不屑于”的背后则是对亲情的不重视，这大多源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向。但“懒于、疏于、不屑于”只考虑到“断亲”主体的随性而为，却忽略了实际情况中主体对于亲属关系的把握与回归，“我也想随心所欲的‘断亲’，但有时候父母那边有啥事，会逼得我们去联系一些亲戚”（访谈对象 Z1）。故而，本研究所关注的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在体现双重面向的同时，“断”得更为意味深长，聚焦时代的兼容性以及学理价值。

第二，本研究对“断亲”现象的描述进行丰富与拓展，在之前的定义与描述中，“断亲”更多是青年群体对于老一辈群体关系的疏远。这样的定义，忽略了“断亲”主体以及对象的多样性。“断亲”的主体不仅仅是青年人，也可以是中年人，亦可以是老年人；“断亲”的对象不仅仅是长辈，也可能是同辈，只能说“断亲”现象更多也更为常见地发生于青年与长辈之间。

第三，“断亲”究竟是从几代以内的亲属关系上断，从定义上需要解释清楚。之前的定义更多侧重于“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要拉倒”的习俗分类，也就是说，第一代是一母同胞亲兄弟姐妹，非常亲密；第二代就是堂（表）兄弟姐妹，已远不如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亲了。说“断亲”是“二代以内的亲属关系疏远”的一种表现似乎没什么不妥，但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从旁系亲属出发，忽略了直系亲属其实三代以内都是较为亲密的现实场景，^③因而需要以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为依据进一步划分。直系血亲代数的计算和旁系血亲不一样，直系血亲是从本人算起，本人为一代，向上父母为二代，祖父母为三代；向下子女为二代，孙子女为三代。按照我国

①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②胡小武将青年“断亲”总结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

③例如在中国，祖父母与孙辈一直是较为亲密的，至少本研究的访谈对象表明，除非祖父母离世，不然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婚姻法的计算方法，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包括叔、伯、姑、舅、姨、堂（表）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女）等。故而在旁系亲属与直系亲属的双重关照下，本文将“断亲”对象梳理为“同三代及以内的亲属关系”，看似比之前的定义增加了一代，但实际上揭示出“断亲”现象中“断”的不只有一个方向，有向上和向下，更有横向的交错。

第四，厘清主体和对象的丰富性以后，进一步发现“断亲”涉及主动与被动两种选择，主动是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等因素考究，是一种自觉的“断亲”，而被动则有自觉与不自觉两种倾向。例如，长辈由于一些家庭利益因素（比如分家产）与亲戚“断亲”，作为双方的子女便被动地与对方“断”了联系，若本身之前就不想与亲戚之间维系复杂的联系，那这种被动“断亲”就是一种自觉的顺势“断亲”，反之便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断亲”行为。

第五，本研究认同胡小武所言“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的理念。因为无论如何“断亲”，“断”的只有相对意义上关系之间的距离，而永远无法断绝血缘意义上的亲属关系。本研究定义的“断亲”，更多需要分析的是部分“断亲”以及有“断亲”倾向这两种程度的“断亲”。似断非断的背后更能体现出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一种妥协，较为温和、隐性的“断亲”现象更具有探讨的意义，而剧烈的完全“断亲”较为少见，且多只是因为一些家庭冲突而诱发。

四、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断亲”现象孕育的土壤

“断亲”作为时代变迁的产物，除了个体的理性选择，仍需要挖掘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要素，从而更好地理解“断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内在机制。

（一）地缘的崩坏：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

传统农业社会受土地束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而农业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熟人社会。亲属之间相邻而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成员具有强烈的群体同聚意识，宗亲互助成为必然，亲属间互动也较为频繁。进入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不仅是各种资源的集聚地与富集地，而且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因而也是就业机会富集地、财富创造地与收入增长地，进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地与工作地。由于各种资源聚集本身会产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故而城乡与区域发展必然存在差异。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资源富集，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好、收入高、竞争环境相对公平，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理性选择。^①滕尼斯所说的“亲属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一种奢望。“因为来南京读书上学，后来就留在南京成家，和老家那边的三代内的旁系就有点断了，我认为主要是迁移的原因”（访谈对象 Z1）。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流

^①陈友华：《理性化、城市化与城市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07—113页。

动，亲属间聚少离多，不生活在一起，又何谈亲密的感情？最亲密的直系亲属间的关系尚且可以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维系，而与一些表亲或远亲的关系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疏远。

（二）价值观多元：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不仅仅包含上文提及的地理位置的迁移流动，还包括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流动之间一直是互相影响、双向变化的动态关系。^①疏离理论认为，社会流动会破坏流动者的个人关系，他们会疏远传统的亲属关系或者原阶层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流动者为了摆脱孤立的状态，会扩大趣缘关系，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是说，伴随着人们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的变化，初级关系（亲属关系）与次级关系（同事与朋友）都会受到影响。

“断亲”现象也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息息相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的共同话语自然较少。不同价值观的人很难谈得拢，也很难成为知心朋友。此外，除了家人、亲属、师生关系以外，社会关系网络更多建立在社会阶层地位相近的人之间，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人之间难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不完全是因为地位高者瞧不起地位低者，更多是由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理想目标、追求、关注点与所遭遇的问题各不相同，因而彼此之间更多属于“鸡对鸭讲”，无法谈到一块儿去。例如，在家庭聚会上，长辈的关注焦点是学业、工作与婚姻家庭。一方面，长辈的“人生三问”确实是其关心年轻一代的方式，保守、传统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对于稳定的生活极为看重。另一方面，长辈的关注焦点确实也与年轻一代的关注焦点存在偏差。

哪怕是同辈群体间，由于人生经历大不相同，也很难聊到一块儿去。“不是我不想和表妹聊天，是我真的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她现在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我关注的她也不一定感兴趣呀”（访谈对象 Q3）。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变迁、社会分化、价值与文化多元的时代，不仅存在不同代人之间的代沟，而且同代人之间的“代内沟”也愈演愈烈。随着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加剧，彼此之间的亲密联系正在渐行渐远。事实上，人们总是趋向于“向上”社会交往，《增广贤文》中“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描述，折射出十分微妙与复杂多样的人世间关系。

（三）人情与金钱：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人情社会”逐渐向“人情与金钱社会”转型的特殊过程，市场的作用正在被放大。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一家一户难以抵御天灾人祸，所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抱团取暖的家族主义存在延续的价值，且许多服务无法从完备的市场中购买，只能依赖于家族内部的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绝大部分需求，市场经济的运行让小家庭与个人有了对抗风险的能力，并且能够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服务。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和科层化。^②

^①刘娜：《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19—131页。

^②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青年研究》2003年第11期，第1—3、10页。

除了直系亲属外，现代社会家庭中的亲戚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过去广泛而有力的“人情社会”相比，今天的亲属链被缩短和削弱。

此外，传统社会由于缺少制度性保障，遇到天灾人祸更多依靠血缘、姻缘与地缘关系的互助来克服。家庭和宗族内在的连带和互助是永久性的，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提供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关系就不大容易瓦解。而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制度的广泛建立与不断完善，人们对血缘、亲缘与地缘等传统关系的依赖程度下降，遇到问题主要靠制度去解决，这也加速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弱化。由宗亲互助逐渐转向社会保障，个人的独立性增强，对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性下降，“断亲”便情有可原了。

（四）减少社交成本：生活压力与内卷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内卷化不断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优质资源总量有限情况下的社会竞争愈发激烈，人们深陷内卷与焦虑，教育扩张且与就业市场脱节、贫富分化与利益失衡、准公共物品与服务短缺等加剧了民众的不公平感。^①

“我的父亲小时候是有着充裕的时光住在乡下祖母家的，他可以尽情地嬉戏，也可以帮助长辈务农，有着有趣而丰富的童年，自然而然与亲戚的关系较深”（访谈对象 Q1）。而现在的大多数学生，从小内卷式的教育与学习致使他们的休闲时光被完全压榨，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维系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家庭子女数量锐减与残酷的升学淘汰机制导致教育陷入排位赛的内卷化竞争。^②在教育压力之下，学生阶段的社交圈与亲戚和长辈逐渐发生分离，这也是为何孩子与同学见面就无话不谈，而在家长面前就“哑火”的原因，“上初中以后，我都没法和同学出去玩了，周末还要上补习班，更别说回奶奶家了”（访谈对象 Q4）。当这部分人群踏入工作领域，逐渐走入中年，又面临着赚钱买房、结婚、生育、教育子女、养老等一系列难题，生活压力巨大，如果还需要维系着没多少感情、也没多少价值的亲属关系的话，会更加身心俱疲，因而他们选择“断亲”，从而减少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社交。“我现在最怕听到哪个亲戚家小孩儿结婚，一有这个话，就代表我要出份子，都是钱哎”（访谈对象 Z3）。以微信朋友圈为例，朋友圈里除了朋友，还有各种复杂微妙的社会关系：职场上的客户、同事和领导，家族里的亲戚和长辈等等。面对社会关系如此多元的朋友圈，在想要发表动态时，便会产生各种顾虑。^③在网络中维系亲属关系的时间成本极低，但这种方式都在隐退，更何况是现实社会中的频繁走动。

（五）数字化生存：趣缘与网络

都市生活中，传统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功能正在弱化，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也正在

①陈友华、曹云鹤：《“躺平”：兴起、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9期，第181—192页。

②陈友华、苗国：《升学锦标赛、教育内卷化与学区分层》，《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55—63页。

③王苒萱：《微信朋友圈弃用者的心理动机探究》，《传媒》2017年第10期，第65—69页。

下降，而基于趣缘和业缘等建立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正不断上升。个人在城市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生活秩序和个人创造的社群网，^① 互联网则为社群网的建立提供了天然的平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爱好选择交往对象。网络的开放性彻底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提高了人与人交往的主动性。^② 自身的完善不仅仅局限于亲属关系的丰满，还体现在与兴趣爱好相似的人结伴同行，这也是趣缘社交关系网络存在的合理性。

数字化生存中建立的丰富趣缘社交关系网络，自然而然会对亲属关系的维系产生挤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娱乐方式是走亲戚、串门、和朋友出去玩，互联网普及之后，娱乐方式是在家中打开电脑，游戏、娱乐、社交。“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往现实中的“人与人”直接互动的生活方式，更别说走亲访友这种长辈所坚持的方式了。

五、顺流抑或逆流：“断亲”带来的影响及重联的可能性

“断亲”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甚至独生子女现象所致，^③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无所谓好坏之分，不是人为努力就能改变的。因此，无论个人是否喜欢、是否接受“断亲”现象，“断亲”现象都会愈演愈烈，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同社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以及适宜生存的土地，传统社会有传统社会的文化，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文化。“断亲”对传统社会而言确实属于逆流，但对现代社会而言却属于顺流，也是一股新流。无论如何努力，传统的“走亲戚”等风俗习惯都难以在下一代有高频率的维系，这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家庭功能与社交成本：“断亲”之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收入逐渐增加，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在这种逐渐富裕的生活环境下，我们也常能听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不那么纯粹了，人情往来都是钱”（访谈对象 L2）等论调。家庭之间经济援助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家庭关系从人情渐而围绕着“怎么挣钱”和“怎么花钱”展开，^④ 感情成分受到了极大影响。

“断亲”现象对亲缘关系、人际关系、婚恋观念等都产生很大影响，最突出的就是来自非制度性的宗亲互动与互助大大减少，家庭与家族的影响力与功能大大减弱，

①章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趣缘群体研究——日常生活的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第54—57页。

②田丽、安静：《网络社交现状及对现实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15期，第13—19页。

③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减少了家庭子女数量，但子女与父母的互动可能因此而增多，特别是独生子女与父母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加，情感可能不是出现冷漠，而是出现了强化。

④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第1—3页。

转而更多依赖于制度与市场解决其遇到的各种问题，传统文化及其存续也将因此面临更多的挑战。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福利制度建立虽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也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弱化，其中情感慰藉功能的弱化成为重要特征。

“断亲”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对于不常见面的、没有情感与经济往来的亲戚，强行维系关系反而是一种负累。“断亲”是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简约机制，否则，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人们身处其中，不堪其扰。当然，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批判现在的人不重视亲情，变得越来越自私，理性选择用于亲情显得有违伦理、甚至“大逆不道”，但实际上，个体化并不会产生一个自私的家庭，也并不必然产生一个自私的社会。个体化，一方面固然培养了关注自我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利他主义的道德标准。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交换等观念，并不排除对他人的关心，只是在过好自己生活的同时，更好地爱身边值得爱的人。而在旧的价值体系中，个体往往必须服从集体，似乎以家庭为重、为别人而活的牺牲奉献才是神圣的，但这在今天显然并不合理。

（二）“伸缩性的弹簧”：“断”后重联

在强调家文化和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人们“断亲”后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经营与亲戚的关系？实际上，亲戚之间的走动看似“断”了，但可以通过一些时间节点象征性地连接，这种现象可以比喻为“伸缩性的弹簧”（图3）。例如，乔迁、结婚等家庭重大事件，会使得一家人在固定的时间节点重新团聚。但“断”后重联也仅仅是通过重大事件重新联系，不一定代表以后会重新连接与长时间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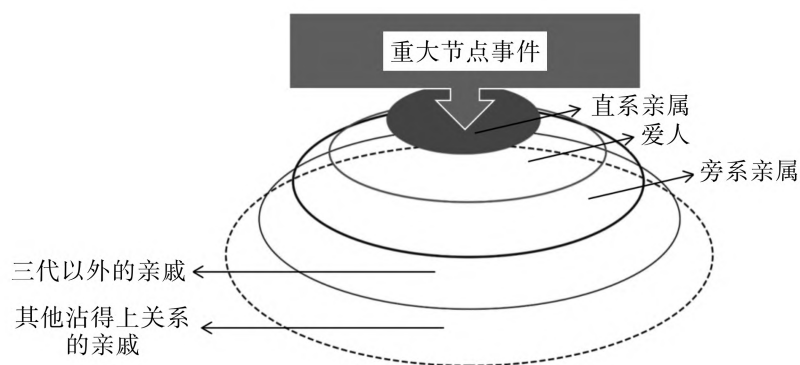


图3 亲属关系“伸缩性的弹簧”

关于圈层顺序，每个人可能都不尽相同。在平时生活中，每天可能只与最上方的两个圈层打交道，但一旦有重大节点事件出现，在事件压力的触碰下，“伸缩性的弹簧”便会向下挤压，例如商量订婚时，直系亲属便与爱人的圈层在事件压力下同属于一个平面；又如春节时，直系亲属、爱人、旁系亲属都要互相走动，可能就被挤压到同一个平面；再如结婚，可能只要沾上一点关系的亲戚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在婚礼场域中大家就同处一个平面。“伸缩性的弹簧”想要表达的是，个体圈层的排

序是一层一层推开的，同时各圈层的思考方式以及与自身的联系也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但当一些重大节点事件出现时，或多或少地在事件的助力之下，原本伸展的弹簧会被压缩，致使不同圈层产生重叠，从而实现“断亲”的回归。

这也勾勒出“断亲”背后一个生动的疑问，即年轻一代似乎是因为还没有完全从父辈与母辈的手中接过维系家庭联系的接力棒，所以仍可以主动地选择“断亲”，而一旦独立门户，不仅可能意识到人情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开始承担维系亲属关系的责任。父母在的时候，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是不单独立户的，不需要与亲属单独往来，因而不需要承担很多责任。但父母年老或者分户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人情往来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例如，考虑到父母的要求与脸面，不得不与一些亲戚保持最低限度的交往。所以，“似断非断”“疏而不离”或许才是“断亲”现象背后生动的特征。

需要清楚的是，价值观念在家庭变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断亲”现象的出现，以业缘、趣缘、利缘、价值观缘等为载体与内在勾连方式的“共同体”，依靠现代科技，并借助于制度性的社会保障与市场性的等价交换原则等迅速扩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血缘、姻缘等亲缘，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形式。未来更好地保持亲属关系的维系必须更多地建立在业缘、趣缘、利缘、价值观缘等相近的基础之上。

六、总结与思考：“断”的只有亲吗？

本研究从亲属关系的定义出发，回顾了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交换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断亲”现象下的社会、家庭与个人亲属关系三角形理论框架，强调个体对于家庭以及亲属关系的理性选择。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强调家文化和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断亲”不是随性而为，通常还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在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下，本研究将“断亲”重新定义为：出于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束缚，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三代以内的亲属关系逐渐疏远的一种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断亲”的主体与对象较为丰富，不仅仅发生在青年与青年之间以及青年与长辈之间。“断”的方向也不只有向上，还有向下，更有横向的交错，“断亲”同时也涉及主动与被动两种选择。此外，“断亲”不是一种正式声明的断绝亲戚关系，无论如何“断亲”，“断”的只有相对意义上关系之间的距离，而永远无法断绝血缘意义上的亲属关系。

伴随着城市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生活压力与内卷以及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断亲”，“断亲”是现代化的结果。尽管“断亲”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家庭功能、减少宗亲互助，但对于个体而言，需要通过“断亲”减少无效社交。“断亲”断掉的是那些一年都未必能见一次的、仅有血缘关系维系的亲戚，亲近的是在经济与情感上都能带来慰藉的家人。这体现了一个成熟的人良好的自我分化水平，其能把握好亲密关系和独立的

平衡。

在一些重大节点事件之下以及青年成家之后，亲属关系也会有所回归，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亲属关系“伸缩性的弹簧”。但无论如何，未来想要更好地经营亲属关系，需要培养相近的业缘、趣缘、利缘与价值观缘，在此基础之上，亲属关系的持续连接才成为可能。

本文从“断亲”出发，但最终发现“断”的不只有亲属关系，每个人都会有社会交往的需求，同样地，在生活压力之下，每个人都有“关系断联”的权利。与“断亲”选择相对应的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重塑。个体根据利益、志趣、亲密关系等因素，来确定社交关系网络的远近，距离自己远近的“波纹”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体系。被“断”掉的人们，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失去亲情、友情，只是在某个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距离稍远而已，已经疏远了的人，不会因为一次聚会就再度变得亲切，层次不同的圈子，硬着头皮也挤不进去，人们总会存在距离自己较近的那群人，距离的远近不仅仅是血缘关系、地理距离，更是心理距离。

在访谈样本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无效的社交成本”。依照前文分析，个体常出于减少社交成本的目的而疏远与他人的距离，例如拒绝参加一些看似无趣的聚会等。但在某些具体的情境之下，人们尽管不愿意，仍旧会前往，原因就在于付出的社交成本短期内看似不会有所回报，但可能会在未来有所体现。在注重关系与人情的社会中，社交回报潜伏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仅凭个体随心所欲的理性选择，完全把人情往来的利益关系抛诸脑后，可能在现行的社会中也并非最优的做法。

因此，“断亲”体现了个体的理性选择与传统亲情观念的拉扯，但如果把视角拉远，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的背后，更是个体性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博弈。人不仅是一切社交关系的总和，也是恩情与亏欠的乘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终究会找到新的亲情存在的形式与社交关系，而最舒服的相处状态永远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与追求。

“Kinship Disconnection”: Concepts, Issues and Reflections

CHEN Youhua, ZONG Hao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mutual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cieties inevitably brings about a shift from familism to individualism. For kinship relationships, people are not only bound b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kinship, but also take more and more rational considerations resulting in increasingly intense phenomenon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ang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s, re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henomenon of “kinship disconnection”, and exploring its breeding 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

ture and life style. A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modernization, “kinship disconnection” has led to the retreat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clansmen and weakened the function of family, reducing the cost of social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Disconnection can also turn out to be reconnected, that is, the “return of the stretched spring”. “Kinship disconnec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rational choice of individuals but also the structural reshaping of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kinship disconnection; kinship relationship; social network; rational choice

(责任编辑 陈 曦)

(上接第 37 页)

in 2016, 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ies on the valu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samples are th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0 to 2019.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ouble differenc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D-PSM shows tha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Heterogeneity testing shows that policy effe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with the listed companies with a combination of two roles and low separation of two powers.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promotes the values via the media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Key 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state-owned enterprise; enterprise value; policy effect; heterogeneity

(责任编辑 彭秀银, 陈金刚)